

一盘棋与小卒子： 中国工人在全球化中的命运

许叶萍 石秀印

内容提要 诸多研究希望用一个词语来描述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工人的状况,然而这里的事实远非那么简单。用基于西方个人主义、契约主义背景的概念,难于透彻地解释中国的工人与这里的劳动关系。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社会传统和社会构造,对影响工人状况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工人的命运既与国家和企业在全球化中的命运有关,又与工人群体在国家和企业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力量有关。

关键词 中国工人 集体主义 契约主义 全球化

许叶萍,北京邮电大学教授 100811

石秀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一、引子——两种社会结构

在日益蔓延的经济全球化情境中,中国工人的命运会如何?一些研究所描述的中国“血汗工厂”被认为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例如跨国公司极大地压缩了中国代工厂和采购对象企业的收益空间,后者转过来又压缩了工人的收入空间。可是,在欧美国家并非这种情况,那里工人的工资并不低,而且在全球化中也没有降低,只是工人的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险遭遇支付危机。在日本,则是作为民族传统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趋于解体。那么,各国工人在全球化中的命运会相同吗?为什么会不同呢?

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命运是由生产结构决定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管理权力在资本和工人之间的分化,导致了工人的被剥削命运。“阶级是整个生产

过程的函数”^[1]。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沿袭结构决定论,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机械大规模生产的时代,生产过程中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被管理方利用,劳动者因为“去技术化”而不得不陷入被剥削命运^[2]。李普赛特(Seymour Lipset)进一步扩展了解释的因素,认为至少有十几个大的结构变量可以解释西方工人处境和行动的差别。其中,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3]。陈峰大概觉得这样众多的变量难免宽泛,让人抓不住要领,因而提出国家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4]。

“结构”是工人命运研究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然而,迄今为止关于结构-命运的研究基本是欧美学者以欧美的现实结构为基础进行的,较少关注东方乃至中国的现实结构。即使涉及东方结构,也假定东方的结构、构造与西方的结构、构造是相同的。所以,

工会如何搞生产？

——李立三、赖若愚的探讨及其启示

游正林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教育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会如何搞生产？这对当时的工会工作者来讲无疑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本文分别回顾了李立三和赖若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并进一步指出了他们的探讨对于我们当前思考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 工会 搞生产 李立三 赖若愚

游正林，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102249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度强调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他还强调，城市中其他的工作，包括工会的工作，都应该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①。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九条规定了工会的四项工作，其中第一项是“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维护人民政府法令，推行人民政府政策，以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第二项则是“教育并组织工人、职员群众，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组织生产竞赛及其他生产运动，以保证生产计划之完成”^②。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就是组织、教育工人恢复和发展生产，

简称搞生产。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概括地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教育工人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斗争。工会如何从搞旨在推翻旧政权的政治斗争转向搞旨在巩固新政权的生产活动？这对当时的工会工作者来讲无疑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在1948年8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李立三（1899-1967）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并负责主持全国总工会^③的日常工作。因此，探讨工会如何搞生产的重任首先落在了李立三的肩上。不幸的是，在1951年12月召开的全总党组扩大会议上，李立三被认定犯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重大错误而被批判。李立三离开全总后，赖若愚（1910-1958）被任命为全总秘书长，后来他又当选为全总主席，于是，探讨工会如何搞生产的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从社会主体到国家意识

——公民社会组织发展及其对意识形态构建的影响

葛道顺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初步恢复、快速发展、规范发展和战略发展四个阶段,目前表现出数量高速增长,但总体弱小、领域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等特点。相关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我国社会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安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回应了改革开放实践提出的社会重组和社会建设的理论问题,丰富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时代内容,增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巨大包容力。我们认为应当摒弃传统社会所固有的关于社会组织双刃剑的观点,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所具有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包含相关政治纲领、法律体系和社会政策的国家意识,通过意识形态的包容以及国家人事、就业、分配、福利等制度的统一,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

关键词 社会组织 社会主体 主体意识 国家意识

葛道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100732

一、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及总体特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型所导致的“全球结社革命”推动了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或 CSOs)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随之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公民社会的生长。

“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以宪法界定的政治概念,以“公民”为基础,强调“公民社会”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公民社会指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其他组织、关系和行动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①。其中,由

公民按照共同利益、需要、兴趣等诉求志愿组成的各种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的重要主体。

在我国,国家民政部按照内在性质和部门列举等方法将我国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划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大类。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而)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②。

1.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阶段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

—— 基于 2005 CGSS 的法社会学分析

杨 敏 陆益龙

内容提要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法治意识 纠纷 纠纷解决机制 CGSS 法社会学

杨 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100081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100732

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过程中,关系结构、利益格局、意识观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进入基层社会的生活之中,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结构和重构带来诸多新的问题。例如,在微观家庭层面,人口结构及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可能使得婚姻家庭纠纷凸显;在宏观层面,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导致的征地拆迁和环境纠纷明显增多,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带来贫富阶层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任何社会的发展,都难以避免矛盾问题的产生。重要的是,一个社会需要找到符合实际的化解矛盾或解决

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我们需要正视社会转型期的矛盾纠纷,探索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一、理论、研究问题及假设

社会秩序及其构成机制问题,是社会学所要思考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社会,人们何以有序地生活?这种秩序的基础是什么?又何以继续?当代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论两大理论流派,对秩序问题的理解有着鲜明的差别。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秩序是社会的本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是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招标项目(项目编号:2009JJD84002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BSH008)和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培育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0XNJ024)的阶段性成果

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模式与解释框架

——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柏 骏

内容提要 和谐社会并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在权利平等基础上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能够找到对应通道进行理性沟通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通道则群体性事件就极易发生,并容易导致势态难以控制,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更可能影响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本文以社会学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详细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和行为模式,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当前群体性事件总体判断的解决路径。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 行为模式 解释框架

柏 骏,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 210004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社会转型、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了社会快速发展的衍生品。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性质多变又极易激化。它的出现既是对党委、政府的考验,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警示,因此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亨廷顿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1],经济繁荣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稳定。由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发展的协调性、科学性不够,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将不断增多,并在特定情形下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显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进而干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负面因素。为此我们认为,如何维护社会稳定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性难题。

纵观群体性事件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其分析的角度是多元的。正如:郭正模等从法学视角认为导致利益失衡的原因有三:一是法律法规不健全;二是行政不依法、司法不公正;三是行政、司法救济手段缺乏,诉求表达不畅。而就法律文化角度而言,主要是由于权利崇拜、厌讼的传统使法律成为政治的附庸,具体地说,就是权利大于法律的观念根深蒂固;“法不责众”,使“一呼百应”成为普遍现象^[2]。毛寿龙从经济学视角,就近年来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无法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实现公平交易原则,政府在市场管制价格(补偿标准)方面的不合理性导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3],在利益诉求过程中会考虑成本收益比,会选择交易成本较小的方式,而这一方式就是群体性事件。他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

论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与社会冲突化解

云立新

内容提要 认识当前我国社会冲突形成的复杂因由及特征,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与社会冲突化解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入手,探究通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感召功能,以重塑社会核心价值认同,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增强人们对现行体制正义性的信仰,对当前化解社会冲突、实现社会顺利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主流意识形态 社会冲突 化解

云立新,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甘肃中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730000

一、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分析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合社会观念、实现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构建和保持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是对于一个多种思想日益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的开放社会,意识形态常常通过其独特的引导和凝聚功能,对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念和人们的价值选择发挥导向和引领作用,以调控社会思潮和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冲突,促进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与和谐环境。因此,站在社会稳定和良性发展的视角,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主动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念,以自身的社会价值取向聚合人心民气,去除社会心态当中的躁动与不安,使之趋向平和理性,重建社会信任。“正如历史上政治经济单位的兴起是与价值

观保持一致相关联的一样,它的衰弱也与共同的价值体系的崩溃有关”^[1]。这里所说的共同的价值体系指主流意识形态。要想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超大社会影响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发挥自己强大的功能。

主流意识形态可以看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基本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的核心体现,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嬗变,引领社会文化和大众思潮,指导人的行为,维系社会团结与社会稳定的旗帜。实践证明,一个国家需要有一个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获得广泛认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才能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反之,一个社会如果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往往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已丧失了导向和聚合功能。特别是在一个利益格局尚处在形成和确立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不同利益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处在过程之中,再加上不同社

义理研究的推进与时代课题的关切

——近年中国哲学研究述评

李承贵

内容提要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呈现出纵深多极化的走向。本文选择性地对易学研究、传统政治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与创新等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评论,并提出了几个值得中国哲学研究同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义理研究 中国哲学研究 述评

李承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210093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呈纵深多极化走向,从出土文献的考证辨析到固有义理的分析研究,从儒学性质的探索到老庄哲学的追问,从心灵哲学的开掘到政治哲学的探求,从研究方法的反思到哲学创作的期待,可谓百花齐放、精彩纷呈。本文无力将所有精彩的讨论、卓越的观点尽收其中,只就“易学研究”、“政治哲学”、“中国哲学创作”三个方面略加展示,兴之所至,予以评说,希望能产生“见微知著”的效应。

一、易学研究的多向展开

易学从来就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且,任何时期的易学研究都表现出新的气象。近年的易学研究仍然表现出很大进展,这里从三个方面加以展示:一是关于文献的研究,二是关于易学史的研究,三是关于易理的研究。

易学文献的研究。人所共知,《易》为诸经之首,但《易》的成书时间、作者归属、作品结构、内容性质、

《传》中卦序排列等,从来都是讨论、争议的焦点。比如,关于《杂卦传》是否存在“错简”现象,一直让许多学者兴趣盎然。比如,李尚信通过对历史上观点的辨析、对《杂卦传》内在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研究后指出,《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因而《杂卦传》不存在“错简”现象^①。也就是说,要确定《杂卦传》是否存在“错简”问题,必须做好两点:一是对历史上的观点要有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二是要对《杂卦传》内在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再如,关于“王家台秦简《易》卦是否是‘殷易’或《归藏》”的讨论。某些易学者认为,秦简《易》就是《归藏》,因而是新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是对于《归藏》本身乃至整个易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揭开易学千古之悬案提供了全新的证据。但史善刚不认同这些观点。他通过对王家台秦简《易》卦的格式、卦画、卦名、卜辞内容的综合考察,指出“王

意识形态话语权、科学性与党性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题

单卫华

内容提要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中,必须要实现从追问立场的传统研究方式向追问范式的现代研究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通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社会批判功能来更加有效地捍卫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从传统解释框架走向新形态探索来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通过坚持科学方法来实现其党性要求。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意识形态话语权 传统解释框架 教科书体系

单卫华,山东警察学院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250014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是“重读”、“对话”还是“反思”,其焦点都是研究方法创新,也即是学界通常倡导的范式转换问题。这也把意识形态话语权、教科书体系与科学性、党性等等基础和敏感问题置于突出的位置。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质,这些问题并没有从“范式”意义上得到清理,从而在直接意义上亦影响着新形态的哲学探索。本文主张,如果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突破,必须完成从追问立场的传统研究方式向追问范式的现代研究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能够通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社会批判功能来更加有效地捍卫它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从传统解释框架走向新形态探索来扩大它的当代视野,通过坚持科学方法来实现其党性要求。

些试图把阶级统治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清除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加入到作为“历史活动”的“解放”之中,从而发展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雏形^①。这既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打开了实践空间,也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开辟了理论道路。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长期的偏好,便源自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培养革命的主体,也即是葛兰西强调的“阵地战”或霸权斗争策略。这种策略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②。不过,正如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因为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抽象和道德说教性质而对其持批判态度,在占据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我们自己不陷入非历史的抽象?

作为最彻底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那

虚拟与实在二重景观下 多元交互主体价值存在的探讨

——网络生活场景的公共性价值理想的反思与吁求

袁祖社 高 扬

内容提要 网络是当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生存境遇。虚拟与真实共在,造成了一种交互场景的生存状况。本文立足网络社会的多元交互主体平台,力图从公共性的价值理想视角出发,试图建构出一种网络多元生存空间,这是一种人按照网络虚拟共同体所引导的正确的价值存在方式来实现自己、创造自己的情景,在其中人们能够超越个体私人理性的“所指”,达到社会公共理性的“能指”。

关键词 公共性 网络空间 多元交互主体 价值理想

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710062

高 扬,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 710062

“1957年,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宇宙,它在宇宙中按同一万有引力定律(它操纵并保持一些天体如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运动)绕地球环游数周。人造卫星固然不是月亮,不是星星,不是能沿着其轨道在一个时间段——这一时间段对我们这些受地球时间制约的凡人来说,是一段无终止的时期——里巡游的天体……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与无与伦比性……这种欣喜却不是一种凯旋……‘人类将再也不受地球的约束’”^[1]。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宇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冲击,促使她开始反思“我们正在做什么”。50多年已经过去了,科学技术对人类思想的冲击远未停止,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造成的冲击最大。今天,网络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人

类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其无所不在的渗透中,其原初的意义已被湮灭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世界中,每个人都被笼罩在这张巨大的“蜘蛛网”之下。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既具有传统文化的文化结构与特质,又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美国学者克鲁克洪和凯利有过较经典的表述:“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样式系统,它既包含显形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2],这里所说的“显形式样”是指人

本文系 2005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市民社会与公共精神”资助项目中期成果

早期鲍德里亚生产—消费 伦理思想解读及评析

魏晓燕

内容提要 早期鲍德里亚思想中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理论缘起于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基于此种理论背景形成的鲍德里亚的生产—消费伦理观一方面对当代西方社会具有巨大的现实批判意蕴,但另一方面由于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这种批判最终只能导向一种观念革命,而这是我国当前消费伦理领域建设特别要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鲍德里亚 生产 消费 历史唯物主义

魏晓燕,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210096

西方学界关于鲍德里亚的研究中,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是将其思想发展的早期指认为处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而将其后期思想归入“后现代主义”学派。但是仔细阅读了鲍德里亚早期的几个关于生产—消费伦理思想的重要文本,不难发现其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逻辑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一、早期鲍德里亚生产—消费伦理观的理论缘起

鲍德里亚早期的思想深受其导师列斐伏尔、巴特、德波等人的影响。列斐伏尔的《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一书,已经开始批评马克思的生产主义;而德波同期完成的《景观社会》也已经是以前景观生产取代商品生产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始性文本。这些思想都直接体现在鲍德里亚的早期文本《生产之镜》和《消费社会》中。在《流行体系》中,巴特以对流

行时装的分析来借以批判当下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分析方法直接影响了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写作。在其早期的这些文本中,“鲍德里亚的理论支撑点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列斐伏尔展现给他的远古社会中未被功用性价值逻辑污染过的象征性本真存在。”^[1]这种思想还可以向上溯源,它的“源初语境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在社会人类学研究发现并奠定的理论逻辑,再经过巴塔耶变形了的哲学文化学的夸大,最后就形成了一种以原始社会(部落)礼物回赠交换关系和非功利性耗费观念为核心的草根主义历史观”^[2]。

莫斯在著名的《论礼物》一文中,通过比较原始部落社会互相交换礼物和当今社会的功利性经济关系,说明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不仅不试图占有,甚至十分敬畏,不惜耗费性付出。这种象征性交换导致了一种持续的、相互性的、平等的交流循环,是支撑全

论法国新尼采主义生命哲学的理论特征

蒋 阳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法国新尼采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背景,集中讨论了以巴岱、福柯等为代表的新尼采主义的生命哲学的思想渊源、重点论题等理论特征,揭示了法国新尼采主义的生命哲学扭转对生命的传统看法,重新把握“内在生命/实践生命”双重性,思考生命的复杂性、矛盾性、神秘性及其永恒回归性的全新理论模式。

关键词 法国的新尼采主义 生命哲学 内在生命 实践生命

蒋 阳,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200092

导 言

在法国,继承和发扬尼采哲学精神,对尼采思想的基本精神、思维对象、重要论题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将尼采哲学研究与文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始终都没有减弱过。尼采对艺术和生命的根本联系的强调、对约束生命的传统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批评,激励着当代法国的思想家,使他们在复兴和更新尼采哲学的基础上,不断思考生命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新尼采主义思想始终处于争论活跃、思路独特、思潮迭起的持续创新状态,哲学和思想领域涌现出以乔治·巴岱(G. Bataille)、米歇尔·福柯(M.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 Derrida)、吉尔·德勒兹(G. Deleuze)等为代表的新尼采主义者,他们的极其丰富的思想论著,都优先探索尼采哲学,讨论生命哲学的

基本论题,以尼采精神研究生命本身的各种现象。在《1968 年的思想:论当代反人文主义》一书中,吕克·费里(L. Ferry)和阿兰·雷诺(A. Renault),作为当代法国反尼采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分析法国 1968 年学生运动的思想基础时指出:福柯、德里达与德勒兹是 20 世纪 70 年代尼采主义最引人瞩目的代表,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起码,在一定形式上,不论在论题和思想图式方面,他们既来自马克思主义,又根源于尼采主义或海德格尔主义”^[1]。

法国新尼采主义的诞生并非是偶然的历史文化事件;尼采本人的思想发展就体现了他与法国文学精神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随着尼采著作不断地被翻译为法文以及海德格尔等学者的尼采研究专著被介绍进法国,法国的尼采研究日新月异,从单一的尼采哲学的专业研究到结合法国本土思想而创造性地阐释和改造尼采哲学,尼采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场

低碳产业研究进展

冉光和 鲁钊阳

内容提要 发展低碳产业是抢抓历史发展机遇与更好应对国际政治压力的重要举措。本文介绍了近期国内低碳产业研究的主要成果,就低碳产业的基本内涵、低碳产业兴起的动力机制、低碳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低碳产业发展的国外经验借鉴等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低碳产业的发展需要与中国的国情紧密结合,需要在总结试点经验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统筹发展,稳步推进,力求将低碳的发展理念贯穿到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关键词 低碳经济 低碳产业 节能减排

冉光和,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400044

鲁钊阳,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400044

自 2003 年低碳经济的概念首次在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出现以来,国内关于低碳经济的研究迅速兴起,低碳经济也逐步从发展理念进化为国家战略和基本政策。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国内学者对低碳产业的研究日益增多。随着人类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逐步进入低碳文明的新时代,研究低碳产业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低碳产业的基本内涵

要了解低碳产业的概念内涵,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低碳经济。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的概念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在国外,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英国能源白皮书》中给出的低碳经济的概念,即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在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庄贵阳(2005)提出的低碳经济的概念,即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从根本上减少人类对石化能源的依赖,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表征的温室气体排放,走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虽然两者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在强调“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却是一致的。

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载体,学者们对低碳产业的概念也进行了研究。崔奕、郝寿义、陈妍(2010)在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08AJY03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0XJL00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CDJXS100222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集体土地制度变迁 与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

王 媛 贾生华

内容提要 新一轮的土地制度改革已进行到创新阶段,地方及中央政府作为制度供给方的态度正在由限制约束转变为探索推动。用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理清我国集体土地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下一步应是,通过多种制度创新实践的竞争结果来确立改革方案,最终形成新的正式制度。

关键词 集体土地制度 制度变迁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 制度创新

王 媛,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310058

贾生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10058

一、引言

解放后至1978年前的集体土地制度变迁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特征,而且主流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变迁的方向,主要包括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运动三个阶段。这个时期的农村制度改革完全成为了服务意识形态和支援国家工业化积累的工具,农民的自利行为被等同于资本主义思想而遭到持久批判,农村制度不但在经济上十分低效率,而且维护制度运行的成本极其高昂。1978年至1983年间的集体土地制度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为主要成果。这是解放后集体土地制度的第一次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然而经济社会

的发展要求更高效灵活的制度安排,农村土地制度不能仍局限于仅仅为提高农业生产服务,而更应该释放出土地作为稀缺资源的价值。这种新的要求已表现在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集体土地流转等制度创新探索。

二、集体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主要是:在初始制度环境下,动力因素推动了制度由僵滞阶段演化到制度创新阶段,进而到制度竞争与选择阶段,最后回到均衡阶段,重新开始新一轮制度变迁的循环^[1]。在诺斯对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的研究基础上^[2],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可以识别集体土地制度变迁的逻辑过程(如图1)。下文依循我国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快征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发育模式与配套政策研究”(批准号:07BJY090)、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宅基地制度体系创新与分区域、分类型、分阶段的改革路径研究”(编号08AJY016)的阶段成果。

人力资本、连带关系与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

——基于扬州市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

冀县卿 钱忠好

内容提要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不仅取决于其拥有的人力资本,而且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利用城市弱连带的社会网络。本文重点讨论人力资本、连带关系对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只有当失地农民拥有较高的为城市生存所需的人力资本且能够有效地利用城市社会的弱连带网络时,失地农民才能增强自身的就业能力、才能在认知以及行为上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因此,对失地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为城市生存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失地农民提供更方便的城市社会网络服务无疑有助于提升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进而有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关键词 人力资本 连带关系 失地农民 城市适应性

冀县卿,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25009

钱忠好,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 225009

一、前言

失地农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据杨涛等(2006)的测算,到2016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超过1亿人。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能否尽快融入城市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疑,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性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是农民角色群体向市民角色群体的整体转型过程(文军,2004)。但是,现实生活中,失地农民的权力缺失已使失地农民演化

为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深受社会关注的弱势群体,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问题已演变成群体风险问题(陈会广,2009)。林乐芬等(2010)对江苏苏州、无锡、南京三地失地农民的调查表明,失地农民的福利效用水平普遍较低,只有27%的失地农民认为城市生活相对过去“变好”,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后从事的职业主要集中在收入较低的运输业、建筑业、商饮服务业等,有28%的失地农民处于无业状态。叶继红(2010)认为,失地农民告别传统农耕社会融入现代城市社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土地市场一体化:演化进程、动力机制及其宏观调控研究”(项目号:7107313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制度环境变化、潜在利润、产权博弈与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创新”(项目号:09YJC790227)的阶段性成果

创业决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

严维石

内容提要 在评析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对个体创业决策进行行为学分析,强调创业决策行为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行为。本文建立一个包含参考点、参照对象和损失规避的行为经济学框架,以现状及其禀赋水平为参考点,决策选择并借助于参照对象对决策收益评估、损失规避推动改变现状的决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创业决策行为机制,最后依据创业行为决策的经济学行为学机制提出针对参考点和参照对象选择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参考点 参照对象 损失规避

严维石,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510080

失业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态现象,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很多国家缓解失业的基本思路之一。鼓励创业政策措施已经在国内外实践多年,我国鼓励创业经济社会政策主要包含几个方面:一是融资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创业融资支持政策,提供政府贴息贷款和发展风险资本市场等;二是税收减免,对创业初期的企业给予税收上面的优惠;三是科技与产业政策扶持,国家与地方层面的科技与产业政策对创业初期的企业给予倾斜。这些政策扶持可能对促进创业起作用,但是没有带来明显的创业高潮。鼓励创业的政策效果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个体做出创业决定,至少帮助做出有利于创业判断。目前,创新政策效果不甚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些政策并没有触及个体做出创业决策核心部

分,没有帮助做出个体创业决策。

为了使得鼓励创业政策取得成效,政策制定者必须先弄清楚个体创业判断与决策等行为特性。依据个体创业决策的行为特征,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帮助个体克服创业决策中核心障碍,这才是达到鼓励创业的基本路径。本文用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来探讨个体创业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及其关于创业决策的应用

行为经济学诞生于主流经济学局限不断被发掘的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对个体决策研究局限于成本收益分析,而在不确定性世界,预期效用理论与预期收益分析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信息经济学

本文系主持 20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青年)“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创业决策研究”(项目编号:10YJC790324)的阶段性成果

引入环境的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拓展

陈 长

内容提要 经典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资源、生态等环境因素舍弃掉了,只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实物替换与价值交换。经典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隐含着一个假定:自然资源供给无限大,不计算自然资源本身价值并且人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远远低于环境承载力。然而,这一理论无法解释现代社会极为关注的环境问题,需要对其拓展。本文在经典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第Ⅲ部类(即环境再生产部类)及对第Ⅰ、Ⅱ部类的价值构成拓展,得出三大部类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关键词 环境再生产 自然力价值 环境劳动价值 三部类再生产

陈 长,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200433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通过研究两大部类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出了社会化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1]。然而,时至今日,传统再生产理论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资源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有了创新和发展的机会。

一、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经典表述及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是整个经济系统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价值交换与实物替换,再生产中的“生产”只限于物质生产,环境是作为经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一,对经济自发发挥作用^[2]。由于环境视角没有纳入再生产体系中,自然环境的客观存在与变化不会影响到两大部类的再生产问题。

以简单再生产为例分析两大部类再生产得以运行的实现条件,发现经济生产与环境的关系如下图 1。在图 1 中显示出:上面实线框内反映了两大部类的实物形态替换和价值形态交换。通过第Ⅰ部类生产所提供的生产资料价值(需求的生活资料价值),与第Ⅱ部类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价值(供给的生活资料价值)的等价交换,同时实现相应的实物替换,从而保证两大部类生产得以协调进行;下面虚线框内的环境系统作为隐含条件是不予考察的;中间是人的经济活动向环境系统索取资源,同时不断排放废物。这里环境系统的承载力是无限大的,其生产能力是不予考虑的,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过程可以独立于自然环境系统以外,前提即是人的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远远低于环境承载力^[3]并且自然资源供

后股改时代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管理研究

吴 婧

内容提要 后股改时代,将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市公司国有股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本文对股改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管理情况进行了回顾,并简述了后股改时代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管理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国有股收益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最后从国有股分红收益年度预算和国有股变现中长期预算角度来探讨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的管理。

关键词 后股改时代 国有股收益 收益管理

吴 婧,扬州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225009

长期以来,受制于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我国各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只能按照静态的国有股“保值增值”和收益最大化目标进行管理,未将其视为国有股预算制度的一部分,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2005年6月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启动,随之国有股流转市场化,可以直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在证券市场上实现国有股份的自由买卖。股权分置改革迄今已满5年,证券市场真正步入了全流通时代,即后股改时代。在此背景下,国资管理部门开始积极探索国有股收益管理的新方式。将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市公司国有股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只有对上市公司国有股分红收益和变现收益统一收缴监管并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对国有股收益的有效管理。

一、股改前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管理情况

追溯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管理的历史沿革,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国有企业利润管理和国有股收益管理。

“国有企业利润管理”(1949-1993)是上市公司国有股收益管理的早期,具体可分为“统收统支”、“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五个阶段。前四阶段基本都是围绕国有企业利润为中心进行的改革,未触动旧体制的框架基础,因而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利润管理带有传统的计划经济特点。直至“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阶段,国有企业才开始走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路,这一阶段“国有股权”概念形成。围绕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诞生了国有股权制度,国有股收益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全流通条件下的国有股权管理研究》(07JA630008)、江苏社科基金项目《股改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研究》(07EYC067)阶段性研究成果

组织心理视角下企业创新决策机理研究

宗 文 李晏墅 宗 盟

内容提要 新经济时代是激发企业创新的时代,企业创新决策的成功源自决策体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自我效能作为决策体自身能力的一种宝贵稀缺的认知资源,在创新决策这种高智能活动中起着内源动力作用。致力于员工心理提升和导向的组织支持,在扮演着双促进的角色中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制约着拓展创造的可能性空间,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有效性。组织心理视角下企业创新决策机理的深刻阐释,不仅能提升企业创新决策科学性、有效性,同时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也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关键词 创新决策 自我效能 组织支持 企业家

宗 文,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46

李晏墅,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210097

宗 盟,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徐州勘测设计中心 221000

时代在变,世界在变,剧烈震荡的经济环境、汹涌而起的全球化市场,以及令人窒息的竞争氛围,使新经济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1]。创新,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从未间断过而且日益凸显,加剧了新经济时代的风险。经济创新时代的企业置身其中,创新决策有如汪洋中的定位,看主企业沉浮。当我们解读企业勇于创新臻于决策,一次次化险为夷的成功背后,会做出多种解释:企业创新决策的意识浓、决策时机准确、决策执行力强、企业创造性的整合和利用资源配合创新决策等等。然而这一切都与企业内部的主体要素——人的因素密不可分,心理学家和行为论者认为虽然外部控制论

强调环境的影响,但在企业中最终制定和参与决策的是人而非其他实体^[2]，“人同时是环境的产物和营造者”(Bandura,1989),作为企业利润和价值创造的不懈动力和源泉,“今天,人的因素,以及我们如何管理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普费弗,2000)。在企业,要激发员工的创新性,必须通过整个人力资源体系的构建来完成^[3]。因此,组织心理视角下剖析企业创新决策机理显得尤为迫切,可以为企业整合资源以提升企业创新决策效能,创造商界神话提供理论指导。

经济创新时代,潮涨潮落,企业面临着成功与失败相互交错的莫测风险和无穷选择,如何以一种积极进取不懈奋斗的姿态,以一种永不言败的成功信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 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任剑涛

内容提要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关键词 儒学 复调理论 古典 现代性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00872

本文特以“复调儒学”的命题，解析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脉络中的儒学复杂结构：一方面呈现与中国古典历史紧密互动的、儒学的多个面相，另一方面刻画儒学在现代处境中多方突围、努力走出困境的思想景象。从而将儒学的真实面相显露出来，既与流行的、单一调门的儒学研究取向划出界限，也与仅仅从政治生活的态势论道儒学性质的定势做出区分。以此奠基，力求将儒学的现代处境凸显而出，并刻画出传统儒学进路与现代性儒学建构的历时画面，以及现代性儒学建构的共时性蕴含。着眼于儒学的活性特质，激活儒学的现代性要素，勾画儒学的时代性特征，吁求现代性儒学的建构，是本文的基本着力点。

一、复调儒学的多维呈现

复调儒学这一概念中的“复调”，是从文学理论中借用来的。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时候指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的确不仅仅是作者所表

中东有关国家政局剧变的启迪： 加强和改善执政合法性建设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而作

季建林

内容提要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我们不仅需要纪念和庆祝,更需要的是冷静地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严峻挑战。中东有关国家政局剧变,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汲取经验教训。通过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来夯实和发展长期执政基础,是党的建设紧迫而又重要的工作。

关键词 执政 合法性 党的建设

季建林,中共南通市委党校教授 226007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年来,走过了世界政党史上从未有过的曲折艰难而又无比辉煌之路,书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辉煌篇章。今天,我们有理由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而大举庆祝,但更需要的是冷静地看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现在,有个极为突出和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面临新的挑战,我们不能掩盖和回避它,而应承认其存在并正视它,通过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来夯实和发展长期执政基础,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努力与奋斗。

一、现代执政党遭遇的执政合法性挑战

二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东欧,以及最近中东有关国家的政局剧变中,人们都

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都遭遇到信任危机,其执政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在群众游行示威中不堪一击,纷纷倒台,失去执政地位,有的下台后甚至解散或被取缔。

这些执政党为什么会遭遇“信任危机”?其执政的合法地位为什么会受到挑战?不同国家,不同的执政党,由于国情党情的不同,原因会有很大差别。但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出发,撇开西方国家对这些国家反对派的支持和输出“民主”、“人权”,煽动“颜色革命”这些外部因素外,中东有关国家的政局剧变,从内因讲,有几点教训是共同的:

一是经济发展不好,社会制度失去人民拥护。当年东欧国家,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与西欧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扩大,这样的社会

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农民利益的思考

双传学 徐 腾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为广大农民谋取正当权益的历史。维护农民利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广大农民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主体力量。党要始终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实现农民利益的保障机制,通过机制的有效运行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历史经验 农民利益 机制

双传学,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 210013

徐 腾,中共扬州市委宣传部 225002

中国共产党在 90 年的奋斗历程中,十分重视农民利益问题,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广大农民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探讨这一历程,对于今天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农民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共产党宣言》中的革命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唯一宗旨都在于为整个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为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根本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3]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4]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

论刘少奇关于“党德论”的思想

郭建新 尹明涛

内容提要 本文将刘少奇“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思想,总结归纳为四个方面:坚守无产阶级立场确保党的前进方向,突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价值取向,秉持集体主义体现党的基本道德原则,塑就党员道德修养体现党的伦理品质。

关键词 关键词 刘少奇 党德论 道德建设

郭建新,南京审计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 211815

尹明涛,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211815

一、党德:执政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基础

所谓党德就是指政党主体(包括政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政党目标上所信奉的、政党活动中所遵循的伦理精神及道德规范。具体来说,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微观层面是指政党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中观层面是指政党各项制度及路线、方针政策所内蕴的道德性和价值意蕴;宏观层面则把政党视为一个整体,是指它的性质、立党宗旨、执政目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等体现出来的价值选择。可以说,党德是任何一个政党在社会生态中得以存在和继续发展的正当性基础,也是执政党在一个主权国家内获得合法性,即获得社会公众认同的关键性因素。从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来说,它不仅关系着一个执政党的党风党誉,还直接到执政党的生死兴衰,恰如孙中山所言:“凡一政党欲求发达、求长久,必须党员明白党义,遵守党德。”^[1]“政党欲保

持其尊严之地位,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立之政纲,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而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2]“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饕害异党,以弱本党之适敌,此种政党,决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3]只有“党德清沌”,党势才能日臻强盛。

二、刘少奇“党德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时代价值

“党德论”就是以党德为切入点和研究对象,形成的一种关于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认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一直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央的全面工作,并曾处于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建设怎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思考和认真探索,尤

转型社会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发现路径

莫良元 夏锦文

内容提要 社会转型语境中司法法治的生成问题考量关涉着司法职业的时代命运,也是司法职业共同体主体自觉的客观诉求。司法现代化的研究困惑和现实困境昭示出司法改革理论根据与实践基础,且诠释出其在法治国家建构探寻中社会层面的动力机理。司法职业的功能回归是社会转型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科学发现路径,需积极梳理使其得以本真回归的相关要件。

关键词 转型社会 司法法治生成 司法改革 发现路径

莫良元,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210046

夏锦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210046

2010年河南赵作海案^[1]在媒体报道之后,社会热议不断。热点案件在转型社会的当下发生,我们的反思应具有整体性,因为公检法在此案中全部都有责任,只要在其中一个环节坚持法治原则都会避免这一错案的发生。事件的偶然性意蕴着某种客观本真的现实印记,理性还原时代命题则是坚持学术研究的社会使命与责任。故而对司法法治生成的中国转型社会语境追问才是解读该类热点案件的主旨所在。本文将以此为切入口试图为法治国家建构探寻中国社会层面的动力机理。

一、司法现代化的研究困惑:转型社会语境中司法法治生成的理论依据

回首最近三十年司法现代化研究^[2]的成就所给予的直觉告诉我们,其整体性路径与现实中国情境悬殊鲜明,逻辑理路清晰却前途趋向模糊^[3]。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发展的春风同样为司法现代化研究开启了多元化的方法论进路,取得的成就也颇为值得学界自豪。但是这些成绩与转型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现实处境似乎关联度不高,甚至因误会而为社会民众所质疑与不屑,司法现代化的研究使

本文系司法部2009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社会转型与司法现代化的范式转换研究”课题(09SFB5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江苏省2009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09B-068R)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江苏高校优势学科(法学)建设工程资助项目,并得到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资助。

宪政中国及其当下法学任务

——基于历史考察的视角

刘爱龙

内容提要 中国法律和法学建立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法制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同时呼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事实上,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宪政民主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内在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当下中国法的历史曾一度在理念与制度建构上谱写了宪政民主的新篇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法的上述传统及其当下历史在中国法学主体性重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中深入探究“中国”的真正意涵,从而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任务和中国法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 宪政主义 宪政中国的历史传统 中国法学研究 主体性重建

刘爱龙,南京审计学院法学院副教授 211815

基于对法学研究中的西方“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警醒,进而出于对当下中国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发展中本民族历史向度的缺失可能影响到中国法学发展前景的深刻忧思,历史法学派的研究路径重新进入我国法律人的视野。目的旨在“开启一个不单有‘主权的中国’、更有‘主体性的中国’的新时代”^[1]。因为“就法律背景而言,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踏上了一条移植西方法律的漫漫不归路”^[2],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中国法学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愈行愈远,而“历史向度的丧失是现代法律危机的原因”^[3]。

一、宪政中国的历史传统

在 1958 年刊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从政治儒学的视角出发,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主张,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宪政民主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内在发展的本质要求。

他们认为,“中国过去政治虽是君主制度,但此与一般西方之君主制度,自来即不完全相同。此种不同,自中国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说,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现为对民意之尊重,且须受民意之考验。所以古来在政治制度上:‘使公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FX004);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8SJB8200006)

论我国监狱制度中的劳动改造手段

刘 柳

内容提要 劳动改造是我国监狱工作中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改造手段,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也是中国现实国情的产物。劳动改造在矫治服刑人员的行为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它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必须进行改革以更好地实现帮助服刑人员重返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 劳动改造 马克思主义 经济

刘 柳,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学系博士研究生

我国的监狱制度和劳动改造手段

新中国的大规模罪犯改造工作起始于 1951 年。在当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全国安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明确了以劳动为改造犯人核心手段的指导思想^[1]。1954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经政务院审理公布,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方针、政策、劳动机关的组织形式和职权范围及对犯人的管理原则都以法规的形式作了规定,从而奠定了新中国劳动改造制度的基础。此后,这一制度几经波折与发展,到 1994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罪犯改造制度。

总的说来,这一罪犯改造制度主要包括三大核心改造手段:狱政管理、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其中,劳动改造是最为重要的手段。《监狱法》第 69

条明确提出凡具有劳动能力的犯人都必须参加劳动。而《监狱法》第 70 条则阐述了劳动改造的必要性及其两大作用^[2]:

A.“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犯罪人员之所以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犯罪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游手好闲。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合法收入以支持自我的生存与发展的。然而一些犯罪人员往往妄图通过各种手段以达到不劳而获的目的,从而走上犯罪道路。因此,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是改掉恶习、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

B.“学习生产技能,为释放后的就业创造条件”。参加生产劳动,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可以培养服刑人员的生产劳动技能以及促进他们智力和认识水平的发展。在监狱中参加劳动,很多服刑人员都掌握了一

中国传统思想与古代文学

——兼论和平环境对繁荣文艺的作用

陈美林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思想极其重视人的社会属性,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相处,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理想,这种思想观念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乃至文化的昌盛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古代文学理论和作品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关键词 传统思想 时代社会 文人生活 文艺创作

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春秋战国时即分门结派,各自立说,百家争鸣,相互辩诘。但自秦汉独尊儒学以来,论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则不得不首推儒学。二千余年来,儒学对我国人民生活(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至深至大,做为“人学”的文学亦莫能外。本文试就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的绵远影响略做论述。

儒学核心是“仁”,“仁”在古时与“人”通,《论语·雍也》“井有仁焉”的“仁”即“人”。儒学对“人”的理论探讨全面而深刻,他们提出的一些观念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早在春秋时期,“仁”字已被较多地提及,如《国语》中出现二十四次,《左传》中出现三十三次,而在《论语》中更多达一〇四次。可见做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受到儒学大师孔子的重视程

度。此后,又经孟子等人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形成儒家的人学思想体系。他们的论题所及,涉及人的本质和价值、人与人相处的准则、人与天(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修养和理想等内容。

首先,儒家人学思想极端重视人,重视人的本质和价值。《论语·乡党》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厩焚。(孔)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问人而不问马,这就表明了孔子对人的看重。他曾对曾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在《易·说卦传》中又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将人与天、地并列,成为“三才”之一。历代思想家无不承袭这一重人的传统,如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赞学》中即云:“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宋人陆九渊更说:“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1]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儒家的

此文为作者在“中华文化与和平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京师词坛“赠柳词唱和”与清初稼轩风

葛恒刚

内容提要 康熙九年,京师词坛上演了“赠柳词唱和”,此为“秋水轩唱和”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稼轩风词学唱和活动。它是在江南词坛稼轩风唱和的影响下发生的,标志着京师词坛对稼轩风接受的扩大和深化,是“秋水轩唱和”能够发生的重要前提,表明清初稼轩风运动的方向是江南→京师,在清初稼轩风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关键词 京师词坛 赠柳词唱和 稼轩风 演变

葛恒刚,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流动站副教授 210097

康熙七年(1668)五月,陈维崧从江南来到京师,其在京城与以龚鼎孳为代表的京师词人之间的交游唱和,为京师词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稼轩之风,在京师词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此以后,京师词坛词学创作发生了重要转向,接连发生了多次稼轩风的词学唱和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秋水轩唱和”。对于“秋水轩唱和”在清初稼轩风演变史上的意义,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曾有专章论述。但在秋水轩唱和之前,京师词坛还发生了另一次规模较大的稼轩风唱和——“赠柳词唱和”。长期以来,学界对“秋水轩唱和”探讨较多,而“赠柳词唱和”却未见论述。“赠柳词唱和”发生在康熙九年,早于康熙十年发生的“秋水轩唱和”,是“秋水轩唱和”之前稼轩词风在京师的一次重要唱和,于清初稼轩风的演进关系重大,是我们认识清初稼轩风演变的重要窗口,应当引起

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所谓“赠柳词唱和”,词史并无其名,是笔者为叙述方便而名之。是指康熙九年发生在京师词坛的为说书艺人柳敬亭题词的词学唱和活动,唱和的参与者有曹贞吉、龚鼎孳、曹尔堪、周在浚、汪懋麟等人。对此,曹禾的《词话》有相关记载:“柳生敬亭以评话闻公卿,入都时邀致接踵,一日过石林,许曰:‘薄技必得诸君子赠言以不朽。’实庵首赠以二阙,合肥尚书见之扇头,沉吟叹赏,即援笔和韵珂雪之词,一时盛传京邑。学士顾庵叔自江南来,亦连和二章,敬亭名由此增重。”^[1]清楚地交代了这次唱和的相关信息:在柳敬亭的请求下,曹贞吉首唱二词相赠柳敬亭,柳敬亭书之于折扇。龚鼎孳于柳氏扇头见此二词,为之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90461128)、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项目(编号0801069C)阶段性成果

老子的自然美学价值观

葛 辉

内容提要 老子美学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然,自然也是老子美学思想的最高法则。这种自然美学价值观立论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社会价值观基础上,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以“道”为核心价值的宇宙美学观;二、以“无私”为核心价值的自然社会美学观;三、以“无为”为核心价值的自然精神美学观。

关键词 老子自然美学 价值观 宇宙美学观 自然社会美学观 自然精神美学观

葛 辉,扬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生 225002

老子思想曾长期被误认为是“消极的、悲观的、厌世的、出世的”,实际上,老子思想并不否定人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和生命价值,它所反对的是世俗的生命观念,代之以更高层次的精神性的生命存在方式——与道合一的生命个体。在老子看来,人类文明化的结局是悲观的、违背“道”的、私欲的世界。因而,人类无法认识到生命的本真——道。在欲望的驱使下,人类的精神被虚假的生命价值观所遮蔽,无法体悟生命的智慧。

回归“道”的生命本真,就要克服欲望和世俗的惯例。这是其反礼价值观的根本原因,老子要回归简单、质朴、平淡、无欲、无为、虚静的生活。老子曰:“为礼者雕琢人性,矫拂其情,目虽欲之禁以度,心虽乐之节以礼,趣翔周旋,屈节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饮,外束其形,内愁其德,钳阴阳之和,而道性命之情,故终身为哀人。”^[1]老子进一步批判了礼乐非饰人性、产生奸伪的根本原因——文明社会的价值观。这种文明社会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

值标尺,以满足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目的,而不是和谐于自然。中国古典美学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美学价值观其实就源自老子,只不过这里的“天”指“天道”,即“道人合一”。

老子美学思想的价值观是什么?美学的价值在于人学,否定了人的价值,美学就失去了意义。从这一角度理解,老子美学的价值观建立于人学基础上,冀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回复已被扭曲的人性。它以“道”为核心,由道学向人学转化,由宇宙问题走向人生问题。人的存在方式是老子美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之一。老子希望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推进人类成为自然进化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以征服自然为最终目的。老子的美学价值观属于自然美学价值观,它包括了宇宙、人类社会、人类精神三个层面。

一、以“道”为核心价值的宇宙美学观

有学者认为,老子消极避世的哲学思想是对“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社会现实的政治回应。不可否

“上海模式”“欧美模式”： 移民小说的文化心态分析和史学地位

汤哲声

内容提要 移民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移民小说是现代小说重要类型。本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移民小说的“上海模式”和“欧美模式”，认为在这些模式背后是现代特有的移民心态和中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并对移民小说的史学地位作了阐述。

关键词 上海模式 欧美模式 移民小说 文化心态 史学地位

汤哲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215123

现代移民小说(文学)的本身是一个尚需完善的概念。为了便于下面的论述,我将现代移民小说(文学)的概念界定为:清末民初至今以留学、打工、投资、定居等方式而移民到新的居住国(地)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

现代移民小说有两次大规模的创作期,一次是清末民初以上海为目的地的国内移民小说创作,代表作家作品有: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贡少芹的《傻儿游沪记》、包天笑的《上海春秋》等等。这些作品所构筑的情节可以称之为“上海模式”。一次是上世纪 80、90 年代以来以欧美为目的地的国际移民小说。国际移民小说在中国大陆真正地红火起来是从 1991 年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出版开始的,这部小说凭借着那部同名电视剧和那则“回家”的广告的热播而为人们所熟悉。如果以这部作品作为范式的话,以后周励、严歌苓、虹影、卢新华等人都属于这个系列。他们的很多小说可以称之为“欧美模式”。移民

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学中不仅具有相对完整的作家群,而且产生过(着)重要影响。虽然一种是国内的移民,一种是国际移民,但都是写移民们在新的移居地的奋斗的艰难过程以及文化的冲突。本文关注的是这些文本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有特色的东西,我认为是:焦虑心态下的社会心态和文化选择。

所谓的“上海模式”和“欧美模式”是指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其基本程序是:首先就是对那些移民极尽嘲笑。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内地人到了上海之后不认识电灯,而将烟斗凑上去;不认识“哈哈镜”,而将镜中人视作鬼怪;不知道六国饭店有多高,仰视而将帽子脱落下来……看到中国人到了美国被车水马龙的街道弄得头昏目眩;不知道怎样吃西餐,抓住刀叉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的劳动价值是多少,拿到薪酬时的惊喜和羞涩……。当这些移民自以为适应了新

“游民”形象与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

陈家洋

内容提要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游民”问题颇受关注;但在文学作品中,“游民”形象却长期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游民”形象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凸显出“游民”的暴力行为及其在革命中的破坏性,这意味着作家重新回到了文化批判的立场上。

关键词 游民 新历史小说 文化批判

陈家洋,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210098

“游民”是个不太容易界定的概念。相比起来,“游民文化”、“游民意识”反倒可能给人较为直接的印象和体验,毕竟这些概念对中国人来说,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可以参照和依凭;自然,也容易在内涵还不太清晰时,就被人用作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工具。近年来,学者王学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游民”和“游民文化”研究颇深。在王学泰看来,“游民”是一个严肃、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但由于“游民”所形成的隐性社会常不入主流史籍记载而使得该问题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梳理了历朝史书对“游民”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对游民进行了界定:“本书中所说的‘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也就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

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与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财物的。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有过冒险生涯或者非常艰辛的经历。”^[1]王学泰指出,在进入宋代后游民才大量出现。游民意识、游民的群体性格正是游民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的产物;而游民文化则集中表现在游民们独特的思想意识之中^[2]。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对游民问题有所关注,并积极摸索将游民纳入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中,毛泽东在讨论完所有的阶级之后,提到了“游民无产者”并对这一阶层做了简单的分析:“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

西方传统中的原型批评与 安徒生童话的圣经原型

顾悦

内容提要 原型批评并不是二十世纪的新发明,而是贯穿两千年以来的西方文学史。诺斯诺普·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全面继承与复兴。原型批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些隐喻性较强的文本。通过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安徒生《海的女儿》、《野天鹅》、《卖火柴的小女孩》三篇童话代表作中的圣经原型,我们能够将这些作品“解码”,发现解读安徒生作品的崭新视角。

关键词 原型批评 弗莱 安徒生童话 圣经

顾悦,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210093

原型批评常常被当作二十世纪的新兴文学批评理论,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与德国心理学家荣格也被当作原型批评的创始人。事实上,原型批评并不是二十世纪的新发明,而是贯穿着两千年以来的西方文学史。原型——“在文学中极为经常地复现的一种象征”^[1]——并不是一种崭新的观念。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近东一带诞生的《圣经·新约》中,就已经有对《旧约》中“原型隐喻”^[2]的诠释。在《新约》语境下,《旧约》中哪怕非常细微的人物、事件、意象都在字面意义之下有着象征意义,例如羔羊象征牺牲、山羊与绵羊分别象征义人与罪人、水象征对罪的赦免等等。《旧约》文本经过寓意解读,就能够看出其对《新约》的预表,例如亚伯拉罕献上儿子雅各,预表了圣父献上圣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预表了耶稣使人洗净罪孽、死而复活、进入

永生等等。而《新约》的最后一部书《启示录》更是以数以百计的《旧约》意象成为“具有严密系统的意象表达”;其“对原型预表手法的运用已臻化境”^[3]。如是,《新约》在《旧约》文字层面之下发掘了一整套的深层象征体系;这种“类型学”诠释可谓最早的“原型批评”。公元三至五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物质世界指向理念世界,因此他们在荷马史诗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字面意思之下读出了更深的哲学含义,例如宙斯与赫拉的婚姻象征思想与创造力的合一^[4]。到了中世纪,受到奥利金、奥古斯丁等教父的影响,寓意解读成为最主要的文学阅读方式。这种方式不仅被广泛用于圣经释经学,逐渐也被运用于阅读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例如,维吉尔的诗歌经过寓意解读,被认为具有预言性,包含了对弥赛亚的守望。诗人但丁将中世纪的“原型批评”推向了顶峰。他认为,无论是《圣经》还是世俗文学作品都可以解读出四层含义——字面的、寓言的、道德的、属灵的。因此,不

试析后技术时代的艺术

王廷信

内容提要 “后技术”是对“后现代”一词的借用。后技术时代与技术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实现方式较为不同。对于技术的谨慎态度、技术使用的大众化、技术的非线性状态、复制技术带来的资源共享均是后技术时代的基本特点。在后技术时代,艺术作品永恒性的消逝、大众对于艺术的非线性参与意识和非线性接受方式、艺术的泛娱乐化的倾向和个人情调式的呈现、艺术对于时尚的强力渗透、艺术对于经济的选择以及对于思考的放弃、艺术对于技术的依赖、艺术的虚拟化和幻象风格成为后技术时代艺术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 后技术 非线性 大众化 泛娱乐化 虚拟化

王廷信,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210098

技术的进步对于艺术的影响是深刻的。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 20 年间,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技术在这个时段的飞速推进已超出了前两次科技革命的成就,从而使人类进入后技术时代。因此,思考后技术时代对艺术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后技术及其所引起的时代变化

“后技术”一词是对“后现代”一词的借用,意即“技术之后”,也就是说继技术时代之后、在技术发生重大变化后的技术。因此,后技术与技术均指技术,不过前者与后者在技术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实现方式上有重要区别,后者也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

麦克卢汉说:“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1]主要是指是为人服务并借助技术手段把人的身体和感官功能放大以实现人的愿望的事物。

技术的发明是与近代西方的殖民策略密切相关的。殖民所造成的急剧扩大的市场需求使原先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无法满足需要。由此所导致的机器大工业的产品批量生产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开始迅速发展。这就是第一次科技革命。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支持还是初步的。在这个时代,技术的服务对象是人自身,而其指向是人之外的世界,着重借助技术加强“力量”与“速度”从而改变自然、为人自身带来利益。第一次科技革命为人类带来的利益集中体现在由节省体力带来的产品批

本文系东南大学重大科学研究引导项目《技术革新与艺术观念变化》(项目编号:3213040101)阶段性成果

论艺术风格中的政治表达

王菡薇

内容提要 在一定的范畴内,艺术具有政治维度和隐喻功能。在艺术的政治表达中,作品的主题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政治表达之间却存在着更加微妙而复杂的关联。艺术风格各要素在所承载的作品中形成某种“话语”体系,并以此来表达某些政治观念和倾向。

关键词 艺术风格 观念 政治表达

王菡薇,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210097

一、何谓风格?

“风格”在最普遍的含义上是指事物的令人可辨别的特征。“艺术风格”则指艺术家在创作成果中所表现出的格调特色。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特征,有时可以反映艺术家本人。譬如说十七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 1660 年自画像,用简约阔大的笔触去雕琢生活重压下的严肃心境和内心感情,而在其 1665 年自画像中则用苍劲老练的笔法、厚重的色彩表现了他生命之末的哀愁。艺术品默默无语,但它的风格却时常暗藏玄机。风格比题材和内容本身更隐秘地成为表达主题的媒介和视觉模式。正如美国艺术史家温尼·海德·米奈(Vernon Hyde Minor)所感叹的那样,“一个有效的假想,即时代精神像密码一样隐藏在风格中,这

个假想,从来没有变成一个公认的定律,但是也没有完全被拒绝。”^[1]人文学者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著名箴言常令人激动不已,“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最值得信赖,因为它是无意而为的。”^[2]艺术这种传递方式之所以“最值得信赖”,一方面由于艺术作品风格常常“发于天然,非由述作”,另一方面也因为风格是众多要素的凝合体。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议对》曰:“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谀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较早地提到了作家作品的风格。而针对画作,风格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形式(form)再现中的独到表现方法;二是指艺术表现的技法(technique)和某个艺术家的独有特点^[3]。“风格”一词的定义是在艺

本文系 200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跨语境艺术史研究下的中国书画”(项目编号:09CF082)阶段性成果之一

从被动到“被动中的主动”： 晚清开埠制度的变迁

李 玉

内容提要 晚清开埠推动力量最初来自于外国,外力是促动中国城市因开埠而开放的关键因素。虽然中国方面不情愿,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示范与扩散效应逐步得到体现,反过来又推进着制度的发展。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开埠制度出现了以“自开”和“约开中的自开”为标志的关键性转变,但中国自开口岸在一定意义上又是“被迫自开”。晚清开埠制度的变迁过程,折射了国人发展观的演进。在“约开”商埠,因被迫开放而被动发展,在“自开”商埠,则体现了相当的自主发展意愿。通过对晚清开埠制度的总体考察,不难说明,止损和防御的动机与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制度变迁。

关键词 晚清 开埠 被动 制度

李 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10093

虽然对于清政府而言,沿海通商口岸并不生疏,从清初的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到 1757 年确立的广州一口,断断续续一直在维系着对外贸易的窗口。但这些只是由清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贸易场域,所以列强对此愈来愈不满,不断要求改变,开辟新型贸易口岸。具有近代意义的口岸始于《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五口通商。以上海为首的首批口岸的示范效应,很快得到扩散,随着其它条约的陆续订立,中国开放口岸不断增加。据统计,仅晚清时期,国内共开放口岸 83 处^[1],依地域划分,东北 26 处,华北 6 处,华中 5 处,华东 10 处,华南 20 处,西南 7 处,西北 9 处。口岸开放城市约占晚清中等以上城市的

28.37%,一般城市的 10.81%^[2]。如此众多的开放口岸,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难以评估,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以往关于开埠的研究,偏重于活动(Activities),众多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尤以开埠通商对区域商贸格局及城市景观与结构功能的影响为多^[3]。这些当然都是城市开埠史或开埠城市史的一些书写与叙事角度,所论均有重要价值。但笔者以为,开埠不仅打开一个城市的对外大门,而且标志着一种新制度的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7JA770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影响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因素探析

杨宏雨

内容提要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政治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又是实现社会全面现代化的保证。回顾从洋务运动开始近 150 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与迟缓对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影响,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难题。而这一难题又是和传统政治文化的阻力、最优模式的误会、方法的错用、社会稳定的不足、市场经济发育不够、公民文化知识程度的低下等因素紧密相连的。

关键词 政治现代化 最优模式 市场经济

杨宏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教授 200433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全方位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现代化是基础,政治现代化是保证,文化现代化是标志,国民现代化是核心。中国的现代化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即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过近 150 年的努力,中国现代化还没能完全实现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与迟缓,它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难题。

一、国人对政治现代化认识的历史回溯

1840—1842 年,英国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由此拉开帷幕。鸦片战争是中国从闭关

到开放的转折点。第一次鸦片战争催生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现代化思想。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开始朦胧地感觉到“夷人”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优越。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美国的总统选举制说:“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又称赞美国的议会制度说:“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公举,可不谓周乎!”^[1]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称颂美国的开国首领华盛顿:“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驳驳乎三代之遗意。”^[2]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现

本文系教育部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10JD710028)的阶段性成果

模 铸 革 命 先 进

——论黄埔军校思想教育方式(1924-1925)

李 翔

内容提要 国共两党以黄埔军校为集合地,借助于多种思想教育方式,将众多革命青年汇聚一块,结成了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组织化的革命集体。在 1924-1925 年,这一集体在反帝反封建,推翻军阀统治方面有着大致相同的认识。这种同一性,很快被塑造为黄埔的集体心理。受群体精神统一律的支配,集体心理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无声的命令,通过传输、暗示、感染、仿效、从众、竞争等机制转化为潜移默化的力量,演变为集体的传统,对黄埔师生具有连续性的心理影响。尽管两党存在着局部的冲突,但此时异质性被革命的同质性所压倒。黄埔师生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舍生忘死的昂扬气概,充分显示了思想教育的突出功效。

关键词 黄埔军校 思想教育方式 政治工作

李 翔,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510515

对军人实施政治工作,为古今中外之惯例。尽管名称、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尽相同,但目的都在培养军人对本方政治文化、社会价值、权威标准的认同与情感^①。“政治工作”是个较为笼统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国别、环境等的不同而改变,但思想教育都固定不变的成为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

所谓思想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某种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教育不是政治工作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指政治工作中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实践活动,也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思想

性部分,或者说是思想性的政治工作部分。就国民党军队的思想教育而言,孙中山常用“精神教育”,蒋介石前期惯用“思想教育”,抗战时起转用“政治教育”,用以说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中的党义和路线教育。名称虽然有异,内容却无甚差别。

本文仅从军校思想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面相,即思想教育的方式入手,分析国民党对军校学员采用何种方法,开展三民主义及其路线教育,由此感悟学员革命意识的升华路径。此外,本文撷取思想教育方式作为突破口,企望从实施过程这“一点”,更好地观看国民党“以党建校、以校建军”时期政治工作的“全貌”。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民党军队政工体制研究”(09L-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内涵、特征与功能

王 贞

内容提要 政治道德关涉政治与道德、政治与伦理之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是围绕政治权力的道德价值要求而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的总和。除了政治道德所具有的阶级性、历史发展阶段性、相对稳定性、相对独立性等一般特征外,传统政治道德还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以君权至上为核心价值;以修身为本作为价值基点;政治伦理化倾向更为明显;政治道德制度化、法律化。传统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对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体系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是规约政治权力健康运行、维护政治秩序稳定、促进政治统治体系发展的基本力量之一。

关键词 政治道德 统治思想 政治体系

王 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300071

政治道德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政治行为以及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前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政治相辅相成,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本文旨在厘清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涵义的基础上,对传统政治道德的特征和功能进行分析和探讨,从而展现政治道德对政治文明的现实建构的价值底蕴。

一、何谓传统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是反映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范畴。唯有厘清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传统政治道德的真谛,对其合理定位。

“政治”是政治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如何界定这

一概念,可谓是众说纷纭。如有人认为政治即国家事务;有人认为政治是与公共权力有关的现象;有人认为政治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有人认为政治即管理众人之事;有人认为政治是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有人认为政治是为社会进行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有人认为政治是“权术”、“霸术”、“统治术”;还有人试图通过一系列关系的综合考察来多层次、多角度地界定这一概念。总体来看,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①。

在先秦历史文献中谈“政”论“治”的材料不胜枚举。“在君为政,在民为事”。“为政”、“从政”、“执政”指行使权力,治理国家事务。礼乐刑政之“政”,主要是指行政。《国语·齐语》载:“教不善则政治。”《论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统治思想视野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08BZS003)的阶段性成果

南朝江东地区的蠲免

汪 莉

内容提要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灾害高发区,蠲免作为重要的荒政措施,在南朝前期对于江东地区的灾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南朝后期,随着江东地区社会危机的显现,蠲免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不再囿于荒政,而是行之于流民,承担起了调节国家、地主与农民在财富分配与徭役承担等方面矛盾的责任,是统治者施惠于民以稳定社会秩序的有益尝试。当然,由于缺乏量化减免标准和官吏实际执行的记载,其可操作性不容高估。

关键词 南朝 江东 蠲免

汪 莉,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其频度之密,远逾前代,各朝统治者均十分重视荒政。学界涉及荒政的研究成果颇丰,兹不赘述^[1],但其中对荒政措施的个体关注则甚为薄弱,且大多掺杂于朝代灾荒史的整体研究当中,将之作为独立措施进行具体考察的论著尚付阙如,亟待深入。蠲免是荒政的重要举措之一,“或免征灾区全部租赋,或减征租赋数额,或延缓征收时间”^[2],均是直接作用于赋税和土地,对于灾后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南朝时期蠲免措施在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各朝延续的惯例,并进一步发展为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长效机制。江东地区作为农业自然灾害重地,其蠲免措施更有深入考察之必要。需指出的是,本文的“江东”指南朝的扬州地区及南徐州大部,包括建康、三吴、会稽、晋陵等地。

一、作为灾后救助措施的蠲免

南朝初期,江东地区的蠲免事例频频见诸史籍,主要内容为减免租调、徭役和刑罚,减免幅度亦视灾情大小而有所不同,基本原则为“畴量申减”^[3],如: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八月,丹阳、吴兴、义兴等地大水,“原遭水郡诸逋负”^[4]。齐高帝建元二年六月,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元年以前,三调未充,虚列已毕,官长局吏应共偿备外,详所除宥”^[5]。齐高帝建元四年六月,诏“水潦为患……建康、秣陵二县贫民加赈赐,必令周悉。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6]。齐武帝永明五年八月,诏“今夏雨水,吴兴、义兴二郡田农多伤,祥蠲租调”^[7]。齐武帝永明八年,因“吴兴水淹过度”^[8],免除该地建元元年以前逋租。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七月京师大水,死者众,

汉季江东扬州始置时间考疑

邢东升

内容提要 汉季江东扬州系孙氏政权的立国根本和核心区域,但是关涉江东扬州始置时间的基础史籍与既有成果却间有舛讹。本文在逐次考辨相关史籍与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汉季江东扬州应建于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六年间,并进一步认为“叛服靡常,分合无定”的军政形势,“史无其文”、“文献凋敝”的史籍状况是造成江东扬州始置时间不明的重要原因,也是研治汉季三国政区地理的难处所在。

关键词 汉季 江东扬州 始置时间

邢东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210013

汉季江东扬州^①系孙氏政权的立国根本和核心区域,但是江东扬州的始置时间,基础史料如《三国志》、《裴注》、《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水经注》、《晋书·地理志》等皆无明文,既有研究如洪亮吉撰、谢钟英补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谢钟英撰《三国疆域表》等又语焉不详;而《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志》等史籍,万斯同撰《三国汉季方镇年表》,钱仪吉著《三国会要》,杨晨撰《三国会要》,吴增仅撰、杨守敬补正《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廷燮撰集《汉季方镇年表》,金兆丰撰《校补三国疆域志》等成果虽有关涉,却间有舛讹。具体而言,舛讹有四:一、《建康实录》以吕范任扬州牧在建安二十八年;二、《三国会要》(钱著)、《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汉季方镇年表》从《元和郡县志》,以江东扬州为孙策所建;三、《三国

汉季方镇年表》以江东扬州始置于建安十四年;四、《校补三国疆域志》从《三国会要》(杨撰)误读《通典》,以江东扬州建于建安十六年前。兹辨析如下,并在此基础上考订出汉季江东扬州始置时间,期能进益相关研究。

一、江东扬州始置时间史实考辨

1. 《建康实录》载吕范任扬州牧时间考

《建康实录》卷一《吴上·太祖上》云:“(建安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权就吴王位于武昌,大赦,改年号为黄武元年。……是岁,改夷陵为西陵,诏扬州置牧,以丹阳太守吕范为扬州牧”^②。据此,吕范任扬州牧在黄武元年,而吴黄武元年即后汉建安二十八年。实际上,吴黄武元年乃后汉建安二十七年,是《建康实录》

①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院青年项目“六朝扬州统郡考”(院青 1015)研究成果之一

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于体制、政策和环境的视角

田伯平

内容提要 开放型经济是江苏的优势和特色，为江苏经济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但粗放发展的问题也很突出。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是江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开放型经济粗放发展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强力主导和政策过度支持。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向以企业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机制的开放模式。外向、内向，主要由企业基于市场形势和自身竞争力决策选择；出口、进口，主要由市场按照需求和价格自发调节。要扩大对外开放的内涵，鼓励探索开放型经济的多样化模式。江苏开放型经济的未来发展应以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为重点、培育新的核心竞争优势为导向、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支撑。

关键词 江苏经济 开放型经济 可持续发展

田伯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210013

一、开放型经济转型是江苏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

在过去的近 20 年，江苏以创新精神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使得开放型经济成为江苏的优势和特色，成为推动江苏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为江苏发展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开放型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江苏经济的今天成就。开放型经济作为一种区域发展战略，对包括江苏在内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 30 年来，江苏正是抓住了两次大的机遇——乡镇企业崛

起和开放型经济大发展，两次创新发展路径，实现了两次飞跃发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央的开放战略中，江苏并没有作为重点地区而赋予特殊政策，但江苏发展开放型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辉煌成就：连续多年实际利用外资全国第一、出口全国第二。开放型经济是江苏的重大创新和突出贡献。

开放型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江苏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开放型经济大进大出、对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双向依赖、粗放发展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

1. 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不可持

本文系江苏省商务厅 2010 年重点研究项目“江苏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总报告摘要。感谢李洁、黎峰、陈思萌、徐清、许佩倩等提供了部分参考材料。

科教资源相对缺乏地区 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常州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启示

洪银兴 范燕青

内容提要 常州市依靠创新发展,建设创新型城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常州的创新发展创造了依靠科技创新的自主创新的模式。在由政府推动建设的科教城中,研究院、孵化器、创业园三位一体,大学研究院和企业合作共赢,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互动推进。常州经验对许多地区的转型升级、转变增长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关键词 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创新发展

洪银兴,南京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210093

范燕青,中共常州市委书记 213003

对常州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常州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创新发展是常州实现跨越发展的根本动力。常州在建设创新型城市进程中创造了自主创新的“常州模式”。这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探索出了一条在科教资源等创新要素相对缺乏的地区实现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

1. “创新发展”是常州经济跨越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个地区能否实现率先发展取决于能否抓住每个发展阶段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常州的发展有过几次机遇。第一次机遇是在改革的初期,在其他地区还在抓革命时,常州率先转向抓经济发展,并率先推进城市国有企业改革(虽然没有触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所产生

的效应是因其经济明星城市而享誉全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发展机遇分别是发展乡镇经济和外向型经济。这两个机遇,常州也抓住了,但较苏州和无锡,起步晚、力度不大,因此其发展水平与苏州和无锡拉开了差距。而且由于马太效应的作用,常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苏州和无锡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一度有苏锡无“常”之说。特别是在其他地区开放型经济兴起以后,常州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已不存在,江苏沿江的其他城市的发展势头紧逼常州。面对与苏州和无锡进一步拉大的差距,面对沿江其他地区追赶的势头,常州经济唯有跨越发展,才能赶上苏州和无锡的发展水平。

常州要能在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水准上跟

本文系南京大学课题组承担的常州市委委托课题《常州市自主创新研究》调研报告的总报告。课题组负责人为洪银兴和范燕青。课题组成员包括王成斌、葛扬、陈强、孙宁华、路瑶、赵华、季小立等。

基于长三角数据的服务业 “成本病”问题实证分析

郑晓芳

内容提要 根据 Baumol 的非均衡增长模型,服务业的发展会导致“成本病”问题。本文根据长三角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的发展是否导致了成本病问题。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还不能说目前已经出现了成本病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已开始显露出成本病的一些迹象。

关键词 服务业 成本病 长三角

郑晓芳,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2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服务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经济越发达,居民越富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越高,这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和必然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最大的部门,服务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提供的就业人数超过国内总数的70%以上,服务业日益成为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经济转型不仅包括资源要素配置方式转型,而且包括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而服务业发展是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重要内容(江小涓,2005)。

但是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认为服务业的过度发展会导致成本病,即跟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发展的低效率会导致服务业成

本和价格提高,带来国家资源的误配;而且随着服务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会越来越慢(Baumol, W.J. 1967)。

二、关于“成本病”问题

Baumol 提出一个两部门非均衡增长的宏观模型,将经济部门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进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而停滞部门劳动生产率几乎没有变化,并认为制造业属于进步部门,而服务业属于停滞部门。当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后,那么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就会越来越慢,经济将出现停滞。服务产品由于无法标准化,不能实现规模经济,在社会平均工资上涨后,服务业的成本就不可避免地会提高,造成“成本病”问题。由于服务业提供的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后,就会对服务品的需求增加,结果